

刘杰曾任地质部副部长、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,是寻找原子弹材料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指挥者之一,笔者在1981年12月采访时,刘杰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。

12月10日 星期四  
给河南省委办公厅袁鹏雁打电话,打听刘杰的行踪。告诉他我要采访的事。他说已经接国防科委办公室周吉一主任的电话,刘书记愿意接受采访。他说刘书记已经到北京开会去了,住在北兵马司宾馆,并告知房间号,他说他今天也要到北京去,约我在北京见面。

12月11日 星期五  
晚8时到北京,住北京办事处。这几天编辑部没有领导来,住在单人房间,暖气很热,和上海比真可谓温暖如春了。

何玉林来聊天,谈了北京于光远、胡乔木等的矛盾。

12月12日 星期六  
清晨去北兵马司宾馆,和袁鹏雁见了面,他说已经和刘书记说了,把我们见面安排在下午及晚上两段时间。有这样充分的安排,我很高兴。上午无事,遂到阜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市部、东单中国书店及琉璃厂古旧书店,随便翻翻看。回到办事处吃饭,然后去北兵马司宾馆,见到刘杰。

刘杰身材修长,满面红光,不胖的面孔,双目更显得炯炯有神。他现在是河南省委书记,曾担任二机部副部长,是原子弹研究、爆炸的组织者。在采访中有不少人都谈到他。

刘杰一见面就说,听周吉一说你在这个系统已经转了很长时间,采访了不少的人吧?我告诉他去了401所、509及在绵阳的九院。他问:马兰还没有去?我说:没去。他说:去了这些地方,基本情况也就掌握了,马兰的条件太差,那里主要是实验。

刘杰说:1952年夏天,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,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。周总理的军事秘书要造计划,就去中科院找竺可桢。竺可桢说,这个东西要有人才,要有钱,得花很多的钱,我们现在搞不起。要搞,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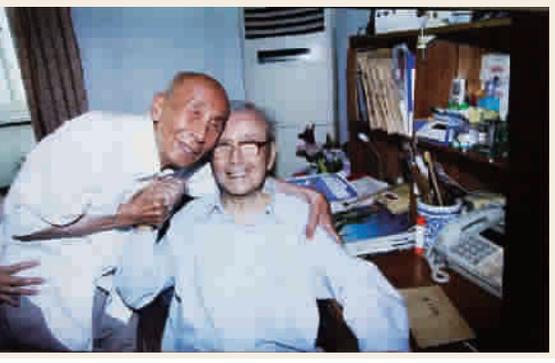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,苏联来了不少专家,那时我在地矿部担任副部长、党组书记,地质部是成立较晚的一个部。当时李四光要回国,美国不让他回来,总理得知李四光回国的决心,就说:李四光不回来,暂不成立地质部。当时有人不了解怎么为了李四光,地质部都不成立。不久,李四光回来了,任地质部长,何长工和我任副部长。李四光回来,影响很大,带动一批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。发现苏联专家中有一位是搞铀矿的,我们要发展原子弹,首先要解决原材料问题,就向他请教如何找铀。刚解放,我们掌握的地质资料不多,就组织查阅资料,从中找到两份有关铀矿的资料。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记述的辽宁海城发现有铀,一份是广西富钟县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有铀。

1954年7月,地质队去了海城,从花岗岩中找到铀,经过计算,这个矿的铀只有800公斤的储藏量,价值不大。后来又去了广西,铀的矿藏很丰富,他们把标本带到北京。我看了矿石很高兴,就去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。总理说你召集找矿的技术人员,明天就向主席汇报。

第二天,我带几位地质人员到主席那里,主席和总理及朱老总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我们把铀矿石放在主席的桌子上,主席拿了铀矿石看了一阵,就问:怎么证明它就是铀矿啊?地质人员拿探测器一探测,发出了“嘎嘎”响声。主席很高兴,说:我们发现铀矿了,我们很多

# 原子弹计划是如何制订的

## ——当年访刘杰



老部长刘杰(左)向杨承宗教授(右)送上百岁生日礼——九十六岁的老人刘杰从折叠椅上站起来,缓缓地弯下身子把自己的脸与长者承宗走去,弯下身子把自己的脸与长者的脸贴在了一起。这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下午,有记者在北京中关村甲二〇二楼目睹的感人一幕。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郑重 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从业40年,现已退休,写一些回忆老同事、老朋友的文章,歌脚为安。

听就懂了。钱三强讲完之后,他向主席提出一个问题:“主席,我们国家是不是下决心要搞原子弹?”这时,主席看着在座的中央领导,说:“这件事我一个人不能说了算,你们看呢?”刘少奇、朱老总、周总理、彭德怀、邓小平都表示赞成搞原子弹,就像一次政治局会议,中央领导取得了共同的想法。会议气氛很热烈,一直开到晚上7时多,主席说: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,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,还来不及抓这件事情。现在到这时候了,该抓了。主席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,他平时不喝酒,这时也拿一瓶葡萄酒,说: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胜利干杯!

1955年7月,由陈云、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,负责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工作。

晚上,随刘杰吃会议饭。饭后,我又陪他到宽街散步,虽是严寒,但并不感到冷。休息一会,我们又继续谈。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原子弹事业,国务院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,部长是宋任穷,他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,刘杰即由地矿部调到二机部任副部长,钱三强也兼任二机部副部长。

刘杰继续下午的叙述:

原子弹爆炸被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是1962年。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,一是1955年,我们解放一江山岛后,美国国会正式授权可以对美国使用核武器。1958年,炮打金门时,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。另一件事是1960年,苏联召回在中国的专家。7月28日,在核工业系统的二百多名苏联专家撤走,也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。这时又恰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,在这重重困难面前,中央毅然决策,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。

刘杰接着讲述:1962年,在南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-2飞机,外交部为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,一位英国记者提问: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,此事是怎样的情况?陈毅副总理没有正面回答,王顾左右而言他。记者会一结束,陈老总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汇报,把我也叫去了。我到了那里,总理给我看了一份内部参考,说:“刘杰同志,美国记者推测说,我们1964年将爆炸原子弹,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,你说说,我们能实现吗?”

我当时感到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,没有思想准备,不知如何回答。陈老总说:“刘杰,你说,你打算什么时候交货,我都等得头发要白了。”我觉得这件事太大了,怎敢轻易回答呢?陈老总又说:你没有原子弹,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不硬啊!陈老总见我说话,他就更急了,说:搞不出原子弹,别的都是空的。刘杰,你是说话呀!陈老总气得直拍桌子,我也被他逼出汗来。最后,我只好说:“总理、陈老总,这样行不行,我回去后尽量写个报告,给中央

一个明确回答。”

让总理、陈老总这样一逼,我们还真的编出一个计划来。我们先把核武器研究院的李觉和朱光亚找来,问他们:1964年搞出原子弹来有把握吗?他们两人开始也是一愣,不知如何回答。我把总理及陈老总的活问他们说了。朱光亚进行了:原子弹理论已经突破,正在进行工艺设计,应该能按时完成。李觉的意见是:原子弹计划出来,需要进行大型炮轰实验,这个实验只有在青海才能完成,现在青海的工程只进行到一半,我们将尽快完工。李觉还提出:1965年“五一”之前,只要把铀部件交给我,原子弹总装,我们就有把握。朱光亚也提出:还有点火中子源,也不能少,要尽量往前赶。

1962年9月11日,我们经过讨论,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,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。我们在报告中提出,请周总理出面抓总。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,聂帅在国防科工委召集罗瑞卿、张爱萍、刘西尧、钱三强、李觉、朱光亚和我开会,研究我们制订的计划。聂帅本人同意这个规划,他说:我个人觉得,第一颗原子弹最好在1964年炸响,不要拖到1965年,因为1964年是建国15周年,有纪念意义。罗瑞卿赞成聂帅的意见。心中有了把握,我感到胆子也壮了,表态说:“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,实现不了,我上军事法庭。”聂帅说:这个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,也是我最荣臻立的,我陪你上军事法庭。聂帅还透露一个消息,军委上要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,同时他的副总参谋长还兼着,但主要精力放在抓原子弹和导弹上。在会上,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要调的126人名单,都是李觉要的中、高级专家,需要他们到青海研究基地去工作。张爱萍一看名单,说最难的是调人,你一下子就要126个专家,而且还要人家到青海去。聂帅说:再难也要调,爱萍,调人的事就由你负责,尽快协调办理。

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,刘少奇同志要罗瑞卿写出《关于建议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》。10月30日,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报告,罗瑞卿这时是总参谋长、国防工办主任。专门委员会的15人有:周总理、贺龙(副总理、国防工委主任)、李富春(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)、李先念(副总理兼财政部长)、薄一波(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)、陆定一(副总理兼中宣部长)、聂荣臻(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)、赵尔陆(国防工委常务副主任)、张爱萍(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)、王鹤寿(冶金工业部部长)、孙志远(航空工业部部长)、段君毅(机械工业部部长)、高扬(化学工业部部长)、罗瑞卿和我。11月3日,毛主席看了罗瑞卿的报告,在上面批示:“很好,照办,要大力协同,办好这件事。”11月17日,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及成员名单,周总理任主任委员,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11月29日,我在专门委员会上提出原子弹研制的人才缺

乏,总理当场决定从各方面调集力量。我们先后从各部门选调优秀科研人员500名。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,讨论了我向中央写的专门报告。1963年、1964年原子工业建设和生产计划大纲,总理看了《大纲》说:“我们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,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”也有的领导说:“刘杰,你们太冒险了!”“你们有把握吗?”“你们不要欺骗中央!”

刘杰谈到这里,情绪有些兴奋。这时,袁鹏雁进来了,说:要吃夜宵了。我一看表,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。我就随刘杰去吃夜宵。我说:还没谈完。他说:已经谈得差不多了。我说:原子弹爆炸的正戏还没上演呢。他对袁鹏雁说:明天再安排一段时间吧。

12月13日 星期日  
下午2时半,我又如约地到了北兵马司宾馆,和刘杰继续了昨天的话题。

刘杰说:主席批示了,这就成为中央的决策,也就没有退路了。

1964年4月11日,总理提出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,采取铁塔空投为主要方式,对地下核试验做准备。9月23日,总理在西花厅召开特密级会议,参加会议的有贺龙、陈毅、张爱萍、刘西尧和我。确定原子弹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,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。爆炸日期确定之后,张爱萍在第一线指挥,刘西尧协助。我留在北京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情。10月15日,核试验基地传来保密电话,根据气象情况,零时定为16日,零时定为15时。总理在电话记录上作了批示给我:“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,请以保密电话嘱张、刘,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。”成武即杨成武,是代总参谋长,张是指张爱萍,刘是指刘西尧。

10月16日,总理给我写了一封信:“刘杰同志,在12时后,当张、刘回到指挥所时,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,告知如无特殊变化,不要再来往请示了,零时后,不论情况如何,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。”

在爆炸前的一刻钟,还有人问我:“究竟怎样。”我说:“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可能。”总理和我们都守在电话机旁。章汉周在听电话:“响了!”总理立刻接过电话:“是不是真的核爆炸?”张爱萍说:“看到了烟云,的确是核爆炸。”总理马上报告主席,主席说:“是不是真的核爆,要弄清楚。”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回答。主席说:“再检……先不要对外公布,等外电报道证实后,我们再报道。”

后来日本、印度、苏联都侦察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。

10月18日,赫鲁晓夫下台。这时我才明白,总理为什么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20日之前爆炸,中央已经预计到赫鲁晓夫下台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我们又立即遵照总理的要求,部署用空投方式进行核爆炸试验。1965年5月14日,轰炸机载着原子弹的航弹在空中爆炸试验,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试验成功。这年的8月9日至10日,总理又召开中央专委会议,检查“两弹结合”进展情况,即导弹的核弹头和运载火箭结合的进展情况。

1965年,周总理又听取我汇报氢弹研究进展情况……

